

· 科学哲学 ·

他心问题之布伦塔诺学派隐线： 认知科学史的考察

陈 巍

(绍兴文理学院 心理学系,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 在认知科学时代,他心问题作为认识论基础置身于读心、社会认知、常识心理学等诸多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题、概念与实体理论之中。然而,从布伦塔诺的意向性学说,到第二代布伦塔诺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迈农的基于判断的情绪理论,再到第三代布伦塔诺学派的继承人海德的归因理论,可以探赜索隐出一条理解他心问题的重要线索。上述进路直接启迪了意向立场、情绪理解和心智理论等认知科学的核心议题,并与近期兴起的直接社会知觉理论与镜像神经元学说之间存在深刻的理论勾连。

关键词: 他心问题; 布伦塔诺学派; 意向性; 意向立场; 归因理论

中图分类号: N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7062(2020)05 - 0001 - 08

在近代哲学史上,延续笛卡尔在处理身心关系时留下的遗产,对应发展出分析哲学的他心问题(other minds)和欧陆哲学的交互主体性问题(intersubjectivity)。迄今为止,虽然上述两种哲学传统都对他心给出精微翔实的考察,但对于他心尚缺乏规范阐释,围绕他心的各种子问题仍是一个松散的集合。

在当代认知科学中,虽然他心问题被部分转换为“读心”(mindreading)“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和“心智化”(mentalizing)等议题,并与社会认知心理学中相关理论,以及现象学交互主体性体系之间存在着交缠难分的广泛交叉,但遗憾的是,传统的心灵哲学史乃至一般的认知科学史都没有很好地交代并厘定上述议题的来龙去脉,只能通过他心问题的四个维度对其学理承续管中窥豹。其中,他心问题的布伦塔诺学派进路是一条极易被忽视的隐匿线索。丹尼尔·韦斯克鲁夫(Daniel A Weiskopf)和弗雷德亚当斯

(Fred Adams)将常识心理学的近代研究追溯至社会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1958年出版的名著《人际关系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一书。在本书中,海德开创了对归因(人们对环境和社会中可观察事件做出的解释)现象背后的心理过程的研究,并第一次将常识心理学的内容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鲜为人知的是,海德是著名奥地利心理学家、哲学家,格拉茨学派(Graz School)的旗手亚利克修斯·迈农(Alexius Meinong)指导的最后一位博士,而迈农则师承弗朗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

布伦塔诺既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也是伟大的心理学家。无论作为哲学家还是作为心理学家,他都做了奠基性和开创性的工作。就哲学而言,布伦塔诺奠基了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基本理念——“在分析哲学中,弗朗茨·布伦塔诺几乎以唯一将意向性的概念重新引入现代哲学而闻名。在欧洲大

【收稿日期】 2020 - 05 - 05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新兴交叉学科重大扶持项目“他心直接感知的神经哲学基础与实验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现象学与神经科学对话中他心问题的重构及其超越研究”(16CZX015)

【作者简介】 陈 巍(1983 -),男,浙江绍兴人,心理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心理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认知科学哲学与哲学心理学。

陆哲学中,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胡塞尔的老师……他的讨论和论证风格是彻底的分析性的,但他的总体计划基本上是现象学的;因此,他是20世纪两大哲学运动的奠基人”。就心理学而言,布伦塔诺开创了迥异于冯特的科学主义心理学的人文主义路线,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终成今日蔚为壮观的人文主义心理学势力。然而,虽然布伦塔诺的学说无论是在心理学抑或哲学界都不乏具有影响力的后继者(例如,胡塞尔之于现象学,弗洛伊德之于心理学),但布伦塔诺作为思想史上的“隐身人”留下了“布伦塔诺之谜”(the Brentano puzzle)也是不争的事实^[1]——“布伦塔诺的思想在历史上是丰富的,且与当今的许多辩论有着惊人的关联。他的影响范围是惊人的,只不过只在某些时候是公开的,而更多时候则是隐蔽的”^[2]。

近年来,随着布伦塔诺学派的复兴,众多的迹象表明,从布伦塔诺的意向性学说,到第二代布伦塔诺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迈农的基于判断的情绪理论,再到第三代布伦塔诺学派的继承人海德的归因理论,可以探赜索隐出一条理解他心问题的重要线索。这对于当代认知科学澄清他心问题的学术史源流,寻觅他心问题在现代认知科学史上与现象学交互主体性学说,以及社会认知心理学理论之间的内在勾连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一 布伦塔诺的意向性学说与常识心理学的意向立场

(一) 心灵如何指向对象

布伦塔诺指出,只有意向的内存性才是心理现象最显著的、普遍的和独具的特征。这一特征也就是引起后人持续不断争议的意向性特征。所以,我们可以凭借这一特征以及上述其他特征来严格地界定心理现象,从而把它们与物理现象区分开来。布伦塔诺说“每一心理现象都具有某种标识,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将这种东西称为关于对象的意向的(或心理的)内存性(inexistence)。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尽管还有些模糊不清)与某一内容的关联,指向某一对象(这种对象不应理解为实在的),或称之为内在的对象性(immanent Gegenstandlichkeit)。每一心理现象自身都将作为对象的某物包含在内,尽管方式不尽相同。在表象中总有某物被表象,在判断中总有某物被肯定或否定,在爱中总有某物被爱,在恨中总有某物被恨,在欲求中总有某物被欲求,不一而足”^[3]。布伦塔诺的这段话回应了近代思想史上的

心物二元论问题。众所周知,笛卡儿区分开精神与物质两种不同的存在,并在二者间划出了一道鸿沟。这道鸿沟使得心理成为一个封闭的存在,它回避了心灵究竟如何在现实情境中活动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谜题,布伦塔诺洞悉到心理总是与对象有关联,并指向对象的。这意味着,心理并非封闭的事物,它与现实世界存在互动。仅仅表达“我感觉”“我想象”“我想要”“我悲伤”“我相信”不具有意义,一种有意义的表达是“我感觉到某物”“我想象某物”“我想要某物”“我相信某事”。所以,一切心理都是关于对象的心理。这就突破了笛卡儿设置的藩篱,为讨论现实世界中心理的具体本质拓展了空间。

那么,心理是如何指向对象的?进一步说,心理现象究竟具有怎样的本质?事实上,布伦塔诺明确地指出了心理的“内存在”,即对象存在于心理之中。我看到晨星,作为对象的晨星是内存在我的心灵之中的。在前述布伦塔诺的思想背景中已经提到,布伦塔诺通过中世纪哲学家借用了“内存在”。布伦塔诺的借用是非常艰难的。他在上述那段话中,加了一个脚注,说明自己在借用这个术语时,有意地避免使用中世纪哲学家的另一种表述,即“客观地存在于某物之中”。布伦塔诺明确指出,“客观地存在于某物之中”容易使人产生歧义,使人误以这种存在如同心灵之外实物的存在一样。我意识到晨星时,并不是说就有作为心理模拟物的晨星的摹本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相反,即使晨星不存在,人仍然可以意识到晨星。心理的关系和严格的关系不一样。在严格的关系中,除非A和B双方都存在,否则A和B在严格的意义上就不能有相关联的关系;但如一棵树在另一棵树的左边,那么这两棵树就都存在。可在心理的关系中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某人思考着事物,尽管一定存在一个思者,但他所思之物却不一定现实存在(例如,金山和独角兽)。就情绪而言也是如此,即使情绪的对象不出现,我们依然能产生情绪体验。显然,布伦塔诺在指出心理并非封闭的存在后,通过这种澄清,进一步避免将心理视作类似物理之物。这与冯特等人的自然科学路线将心理类比物理的做法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总之,布伦塔诺最早把心理现象或心灵的本质属性概括为对象之意向的内存性,这就是他的意向性学说的精髓所在。心理现象是离不开对象和内容而独立存在的,它一定要指向一个对象,关涉一种内容,即一定要意向地将一个对象包含在其内。正如维内(W. Viney)等人指出“如果布伦塔诺有机会

设计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计划,那么他所偏爱的课程标题将可能会使用动词形式而非名词形式。因此,所教课程的标题不是 sensation 和 perception(感觉和知觉)而是 sensing 和 perceiving。布伦塔诺偏爱主动的动词形式而非被动的名词形式是基于他对经验本身的理解,经验是一种主动的、参与的、创造的和建构的过程;它不是简单地构成惰性的、静止的或被动的内容。”^[4]

(二) 常识心理学的意向立场

在今天的认知科学中意向性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所有心理状态的属性,这与布伦塔诺的看法基本一致;二是行为的属性,正是因为行为有这一属性,我们才会说行为是有目的、有意图或是有意地做出的。综合上述两个方面,意向性往往以命题态度的方式呈现。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是自主体(agent)对命题所持的一种心理状态:信念、愿望、希望、恐惧、意图等。命题态度通常被认为是思维及其内容的基本单元,从人的视角看,命题态度可以是正确的也可以是错误的(例如,我相信现在在下雨,即便实际上并没有下雨)。一个自主体可以对同一个命题有不同的命题态度(例如,“A相信他的火锅是热的”和“A希望他的火锅是热的”)。在语言学上,命题态度由动词来表示。显然,“命题态度”都是带有意向性的心理状态。它们是在特定的心理模式或形式下,关于或代表事物的对象和状态。知觉、信仰、愿望和意图说明了心灵意向性的基本二元性:心智对世界和世界对心灵的契合方向之间的二元性。

最典型的带有意向性的心理状态即是意图(intention)。意图是指行动之前的前态度,如行为的目的和指向等。意向性侧重行动的性质,即有意图或有目的地付诸行动,或者说有意向性的行动即有意向地做出行动。而“意向”表示的是人在行动之前的心理状态,它表征了行动的原因,有行动发生就表示有意向在此之前发生了。当然如有意图出现,但之后没有相应的行动发生,那么我们可以把意图归之于行动者,而对其不做意向性判断。因为他可能有意图而没有行动。但反之,如果对行动做出意向性判断,那么一定包含了对意图的归因,即把某意图归因于行动者。由此,延伸出常识心理学在认识论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意向立场(intentional stance)。意向立场是心灵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受布伦塔诺意向性学说启示创造的一个术语,指的是我们从心理属性的角度来看待

一个实体的行为的抽象程度。意向立场是丹尼特提出的心理内容理论的一部分,它对于常识心理学的意义如下:

“它(意向立场)是如此工作的:首先,你决定将产生行为的对象预测为一个理性的自主体;随后,你要弄清楚这个自主体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信念,给定它在世界上的位置及其目的。然后基于同样的考虑,你推理出它应该有什么欲望,最后你预测这个理性的自主体会根据它的信念采取行动来实现它的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从所选择的信念和欲望的集合中进行一点实际的推理,就会得出一个关于自主体应该做什么的决定;这就是你预测自主体会做的事情。”^[5]

正是上述带有意向性的心理状态构成了常识心理学的意向立场。丹尼特认为,常识心理学为一个特定的行为提供了系统的“给定原因的解釋”,并基于对自主体的深刻嵌入假设,解释了该行为的历史起源^[6]。

由此可见,布伦塔诺的意向性学说经由丹尼特的意向立场奠基了整个常识心理学的话语方式。

二 迈农的对象理论与基于判断的情绪理论

(一) 迈农的对象理论对意向性的拓展

迈农认为,在心理现象中还存在内容。内容是心理现象的一部分,它随着意动的出现而出现,始终是当前的(present),并且是实在的(real),与意动有着同样的存在方式。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心理现象的独特性,使其与其他心理现象区别开来。如前所述,心理现象间的差别主要在于意动。但在同一种意动中,不同心理现象的差别则在于内容。迈农指出“对于不同对象的表象可能在意动上是一致的,但它们在其他方面存在区别,这个方面可以称作‘表象的内容’。”^{[7]45}

然而,由于内容和客体密不可分,以及它们独特的性质,使得内容很难在其真实性中被揭露。事实上,当我们生活在内容之中时,我们通常不把注意力放在内容上,因此,我们完全没有用语言来描述它们在质量上的细微差别。举例而言。如果我在听音乐,我可以停下来审视一下我对所呈现的旋律的内在感受。心理意动的要素是实际的听见,但这种情况下内容是什么?在内省中,我真正注意到的是我所听到的旋律或声音,这就是我所听到的对象。那么,内容在哪里呢?根据迈农的说法,我感觉到的内

在对象不应与内容混淆。当你在银幕上看一部《泰坦尼克号》电影时你也看到银幕本身。然而,如果我让你描述一下银幕是什么样的,而不允许涉关于这部电影的东西,那就很难了。在这种类比中,内容与对象的关系类似于屏幕和屏幕上电影的关系。由此,迈农通过对意动加以重新界定,区分出对象与内容,使得意向性获得了重大的发展。以对象和内容的区分来看“对象不能进入心灵,而是可以借助内容进入思维变得可通达;内容虽然在心灵之中,但很难直接理解,因此通常是借助对象来掌握的。”^[8]心理是具有意动-内容-对象的意向性结构,在对心理进行考察时,必然从意动对对象的把握开始。

迈农在布伦塔诺的基础上提出了五种主要的意向性形式:表象、判断、假设、情绪和欲望。这些心理意动始终指向对象“当一个词表达了一种呈现的体验时,它就意味着某种东西,因此呈现的对象就是意义(意谓[Bedeutung])。”^{[9]28}“意义”(meaning)有两种用法:(1)意义作为一种符号和经验(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表达经验的关系;(2)意义作为一种符号和通过表达的经验(更准确的是通过相应的心理内容)所呈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即表达经验对象的关系。类似乌云之于雷雨,眼泪之于悲伤等自然的、“真实的”符号,以及诸如一组词汇表达心理活动等人为的、“最后的”符号。一种经验(快乐、悲伤、信念)可以被一个对象所表达(微笑的脸、眼泪和一组词汇与之分别对应)^{[9]6}。这种对象(更准确地说存在对象的事实)让你知道表达行为(经验、心理现象),因此,符号的功能是指符号背后的行为就是它的意义。

(二) 迈农的基于判断的情绪理论

在对象理论的基础上,迈农的情绪理论通过使用内省、思想实验和论证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总结了布伦塔诺心理学在情绪领域上的应用。沿袭布伦塔诺心理学的基本原则,迈农通过重新主张情绪是对象指向的来开始他对情绪的分析。根据迈农(以及布伦塔诺)的观点,这对所有的情绪状态都适用:如果一个人感觉到高兴,那么他总是对某事感到高兴(例如,故友重逢);如果他感觉到害怕,那他总是对某事感到害怕(例如,好友遭遇车祸)等等。迈农认为,这种内省确认的事实具有一种直接而深远的意义:它需要情绪以认知为前提条件^[10]。更准确地说,任何(对象指向的)情绪,其存在都以一种对其对象的认知表征为前提:

一个人如果不为某事感到愉悦,就不会感到愉

悦。因此,他无法理解一件“事”,一个对象,他就不会感到愉悦;并且有理由认为这种理解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认知成就^[11]。此外,迈农主张情绪之间的区分(例如,超越积极和消极感受之间的基本区分)主要在于它们所基于的认知。因此,要理解情绪的本质及其因果生成,首先必须要澄清它们的认知前提条件。迈农根据情绪的认知前提条件,以一种系统的“情绪分类”形式提出了这种澄清,更准确地说我们可以将这种分类称之为情绪的认知结构理论(cognitive structure of emotions)^[12]。迈农针对情感状态的整体分类学中的一个情绪子集深入阐释了该理论,这类情绪也被称之为基于判断的情绪(Urteilsgefühle),因为它们的认知前提条件是判断(例如,信念)。基于判断的情绪包括在日常语言中用如下名字以示区分的情绪,诸如针对另一个人的愉悦、悲伤、怜悯,以及希望、恐惧、愤怒、内疚和羞耻。

按照迈农的观点,基于判断的情绪具有两个主要特征并与其他情绪区分开来:(1)它们具有命题或事件状态作为对象。(2)它们的存在都是预设了对它们指向对象的信念或判断。例如,对于事件状态S感到愉悦(例如,施罗德被选举成为总统)预设了实现S的信念。此外,在愉悦的情况下,这种信念必须是确定的:如果他并不坚信实现S而是认为S只是有可能得到,他不会为S感到愉悦,尽管他可能希望实现S^[10]。

然而,日常经验显示并非每一种信念都会产生情绪,并且针对获得某个特殊事件状态所具有的同样的信念在某些人那里可以产生愉悦,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则会产生悲伤。迈农指出,为了解释这些事实,需要进一步假设这些情绪的心理前提条件。尽管他没有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但他认为至少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额外的情绪前提条件是一种动机状态,一种对上述(想要的)事件状态的欲望或(不想要的)事件状态的厌恶^[13]。这代表了迈农在这个问题上的普遍立场。因此,如果一个人相信并渴望事件状态S,那么当他体验到S时就会感觉愉悦,如果他相信并厌恶事件状态S,那么当他体验到S时就会感觉悲伤。关于情绪的产生过程,迈农假设,在典型的情况下,愉悦和悲伤的产生如图所示:首先,人们形成对事件状态S的渴望或厌恶(例如,施罗德被选举成为总统)。随后,通过知觉或推理,他获得S实现的信念。随后,欲望或厌恶与信念一起产生了一种指向同一对象S的愉悦感或悲伤感。按照迈农的说法,这种指向对象的愉悦感或悲伤感是一种愉

悦或悲伤的情绪,或者至少分别包含了上述情绪体验的核心^[11]。

具体来说,迈农假设信念的强度(确定性的程度)将希望和恐惧从愉悦和悲伤中区分出来:如果有人不确定是否能够实现一个渴望的时间状态,他会感觉到希望而不是愉悦,如果他不确定是否不希望实现一个渴望的事件,那么他会感觉到恐惧而不是悲伤。根据迈农的看法,确定/不确定的区分反映了一种心理状态模型中的差异,这是一种相信方式(坚定地相信/不那么坚定地相信)的差别。然而,基于判断的情绪之间的大部分差异是由于作为情绪基础的信念(以及欲望)的命题内容的差异造成的。例如,如果对事件S的认知状态有关于某人自己的幸福,那么他就会感到愉悦或悲伤,而如果S更准确地说关注的是另一个人的幸福,那么按照迈农的理解,如果S关注的是另一个人的情绪体验,那么他就会感觉到“同情(sympathy)或反感(antipathy)”的情绪^[14]。具体而言,如果有人相信另一个人体验到了一种积极感受,并渴望这种感知到事实,那么他就会为他人感到愉悦,而如果他相信另一个人体验到的是消极感受并厌恶这种事件状态,那么他就会对他人产生怜悯。这就是“同情的情绪”。“反感的情绪”是“嫉妒/愤恨”以及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当他人遭遇不幸时感到愉悦)^[15-16]。如果一个人相信另一人体验到了积极的感受并厌恶这种感知到的事实,那么他会感到嫉妒或愤恨;如果一个人相信另一人体验到消极的感受并渴望这种事件状态,那么他就会产生幸灾乐祸。

三 海德的归因理论与 常识心理学的信念-欲望心理学

(一) 海德的归因理论与意向性在社会感知上的绵延

海德在迈农指导下很好地融入了格拉茨学派对知觉的关注,迈农的工作激励着海德进一步思考——既然感觉特质是在“这里”(在“心灵”中的),而对象特质是在“那里”(在物理世界中),那么我们把特质看成是对象的特质又是如何可能的呢?海德对这个难题的解答是第一批知觉因果理论之一——这个理论描述了对对象属性及其与之对应的知觉属性之间的因果链^[17]。

海德理论的核心是在事物(物理对象)以及事物“通达”(access)感知者所借助的媒介之间的差异。按照海德的观点,事物是连贯的单元,它们具有

相互依赖的部分,并因此在塑造其周围的形式和过程上具有因果效力。海德喜欢用滴答作响的钟表作为例子,钟表会引起系统的空气振动(声音),振动会刺激我们的耳膜从而被我们感知到。海德认为这是事物塑造了媒介,而反过来不能成立,因此知觉装置必须从它们对媒介的影响中建构事物,并最终在感觉上重建事物。海德把这种重建过程称之为知觉归因(perception attribution),他认为这种归因不关注媒介的特性,而是关注事物的意向特质,因为这些特质塑造了其周遭的媒介。因此,当我们看到一栋房子时,我们会说“我看见了房子”,而不会说“我看见了阳光”,即便阳光是我们能够看见房子的必要媒介^[18]。

那么,如果我们通达的不是物理对象而是他人呢?延续布伦塔诺和迈农对于意向性问题的思想,这种“关指性”(aboutness)总会“伸展”超出心理活动本身指向外部世界中的东西。这赋予一个自主体这样的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主体不可避免地拥有这样一种倾向:我们会根据他人意向性的心理过程去窥视与理解他人,看到他人时我们总想知道他们的心理状态是什么,以及他们的心理状态是如何活动的。

为了证明知觉归因对于人际互动的意义,海德及其学生玛丽安·西梅尔(Marianne Simmel)开展了一项著名的心理学实验,他们通过向被试播放一小段由随机四处活动的两个三角形和一个圆圈围绕一个正方形运动的动画视频,然后他们询问被试看到了什么。有趣的是,被试会用故事来解释场景中发生了什么。研究发现,大多数参与者将圆圈和蓝色三角形描述为“陷入爱河”,而“大坏蛋”灰色三角形“试图阻止它们相爱”。被试用故事来描述这些几何图形的活动,描述它们的活动场景,就好像这些物体有意图和动机一样“这些运动是以人的行为组织起来的。这种组织很明显的具有许多来自人的视角的优势……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当这些变化被确认为是一个图形单元时,它们就不再以任意和无关的方式相互追随。它们与环境的不变特征相联系,它们有意义地嵌入了我们的现实图景之中……对运动的解释与对不变性的解释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借助动机来描述运动再一次捕捉到环境层面更大的不变性。就像通过行驶中的火车窗口看见的窗外景观的连续视角只能通过处于空间中远处物体作为参考才能被‘解决’,或产生有意义的单元,因此,为了让连续的变化成为一连串有相互关联

的事件,就必须通过动机来看待人的行为。”^[19]

显然,被试在这些图形的随机活动中看到了信念、意图、欲望和情绪等心理状态,这项工作也奠基了海德的成名之作、当代社会心理学经典名著之一——《人际关系心理学》的基本思路。海德在其早期关于物理对象知觉的研究中,使用归因(attribution)的概念,指的是从知觉经验的特征重建远端对象。在人际关系心理学中,他把归因的概念扩展到对他人的感知上,然后不得不处理嵌入人的感知的更复杂的结构。因为海德很清楚,与无生命的对象相比,人是非常不同的“感知对象”。人可以“被感知为行动中心,因此可以对我们做一些事情。他们可以有意地对我们有利或有害,我们也可以对他们有利或有害。人具有能力、愿望和情绪;他们可以有目的的行动,能感知或者注视我们”^[20]。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简短的引用中,海德两次提到了人的意向性/目的性(purposefulness)。他认为这是常识心理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因此,这本书真正新颖之处在于深入探索人们用来描绘人类行为的常识概念框架(包括可以、想要、意欲、应该)。

(二) 常识心理学的信念-欲望理论

遗憾的是,大多数后续的社会心理学与社会认知的归因研究都错失了海德上述最重要的贡献。海德归因理论对于他心问题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尝试揭示:单纯的常识理论,无论是物理学的还是心理学的,至少应该是一个具有类似定律因果推论形式的心理表征体系,能够被广泛用于解释或预测的情境之中。这套推论还应与行为证据(动作和他人的运动,如面部表情、演讲模式和身体姿势等)结合起来,以便于人们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归因,描述他人的内部心理状态,并将其心理状态与其未来的行为关联起来。约莫40年后,心灵哲学家卡拉瑟斯(P. Carruthers)在海德归因理论基础上尝试给出一些有关常识心理学的候选定律。例如,“有人想让q状态出现。他相信,如果p那么q,并相信自己有能力使p出现;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就会形成一个促使p出现的意图。若有人已经形成了意图,促使‘R出现,p出现得以实现,且他相信R不会出现,因此,他就会采取能够促使p出现的行动,’”^[21]。然而,类似的常识心理学定律不仅很少,而且在许多方面并不明确,对其进行表述时常需借助其他附加条件(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理论注定只能对知觉、思维和行动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给出一般性描述,而无法精确定

义所描述状态产生的条件,也无法明确而无例外地描述其背后的动态机制。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发展心理学家威尔曼(H. Wellman)提出的信念-欲望关系推理假说。它假定信念来源于知觉,欲望来源于情绪和生理状态,信念和欲望产生行动,而行动则带出情感反应^[22]。

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总是将我们关于心灵、世界和行为的日常推理系统描绘成一种“信念-欲望心理学”(belief-desire psychology)^[23]。这种日常心理学通过诉诸他人的所思、所知与所期望的东西与他自己想要的、意欲的与所期望的东西耦合起来(被称之为“心智理论”),从而为意向行动提供解释和预测(被称之为“心智化”)。为什么吉姆会去打开抽屉:是因为她想要吃巧克力,并且相信巧克力在抽屉中。日常心理学还包含对心理状态起源的推理(吉姆想要糖果是因为她饿了;吉姆认为它在抽屉中,她上一次就是在那里看到糖果的)。即,日常或朴素心理学包含了各种相关的构念,诸如驱动和偏好,它们是人们的欲望的基础,而知觉的-历史经验是人们的信念的基础。它包括由欲望、信念、意图、行动和知觉产生的情绪反应——欲望得不到满足产生愉悦,欲望得不到满足产生沮丧,当事件与某人持有的坚定信念相冲突时产生惊奇。

因此,信念更明确地关注一个人的心理“内容”。回忆一下越剧名段《十八相送》。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关于欲望、情绪、知觉等等。祝英台不仅渴望得到梁山伯的爱情,并且不断地暗示、提醒结伴而行的梁山伯,但是后者完全不知道前者行动的意图。然而,这并非一个妾有情郎无意的纠结故事。梁山伯不仅不知道祝英台为什么会如此表达,他还相信她是男的。理解心理内容的内在领域的可能性(观点、思维和意象)是心灵“表征”理论的标志。当世界的内容(祝英台是女的)与思维的内容(祝英台是男的)相冲突时,理解错误信念为这种表征理解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但又是日常的例证。

四 余音

事实上,布伦塔诺学派留给他心问题的丰富遗产绝不仅仅局限于上述枚举的只鳞片爪。近20年来,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与神经生物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在认知科学哲学内部有关理解他心的解释模型、认知与神经机制以及争论重新燃起了哲学家、心理学家、人工智能专家与神经科学家的研究热情。无疑,他心问题作为认识论基础置身于相关的问题

域中。近期,一种逐渐兴盛的现象学主张——直接社会知觉(direct social perception, DSP)理论质疑了传统他心问题在认识论上的心智主义(mentalistic)和理智主义(rationalism)立场^①。DSP认为,读心是知觉而不是认知的,我们可以直接感知他人的某些心理状态。DSP是一种非推理的读心,它设想我们可以直接通达他人的基本情绪状态和运动意图。在这些情况下,感知他人的情绪状态类似于感知诸如桌子或椅子等的属性。当感知到作为一张桌子的属性时,不存在推断或判断它是一张桌子的额外步骤。同样,当我看到一个人微笑时,我也不需要推断他们是快乐的。相反,我看到的快乐直接呈现在他们的表达中,因为情感是在表达中体现出来的^[24]。DSP不同于行为主义。行为主义主张情绪状态可以简化为表达状态,而DSP认为表情部分地构成了(constitute)情绪状态^[25]。因此,快乐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微笑,而是微笑是快乐的组成部分。其他部分包括生理反应(如心率加快)、现象体验、认知特征(如态度,以及注意和感知转换)和意向对象。

鉴于布伦塔诺学派与现象学之间的紧密联系,不难发现两者在DSP的焦点议题上惊人的一致性。例如,现象学家奥夫高(S. Overgaard)在论证他心不可观察性(unobservability)原则的缺陷时举证:风是流动的空气,但流动的空气是看不见的。我们无法从视觉上分辨出面前哪些部分的空气是流动的,而另一部分静止不动。然而,仅仅通过视觉手段,风可能很容易被识别。我们可以看到风摇曳着树枝,让树叶漫天飞舞等等。将树叶漫天飞舞的情况归类为风可能是一种纯粹感知上的成就,即使风本身并不是可以观察到的。在这里,奥夫高的论证与海德的知觉归因理论将事物意向特征塑造周遭媒介的思路如出一辙^[26]。此外,也有神经科学家甚至认为,作为直接社会知觉基础的镜像神经元活动机制是“将布伦塔诺的古老现象学解释成现代脑成像技术正在涌现的新语言”^[27]。迈农的另一位重要弟子维托里奥·贝奴西(Vittorio Benussi)对于具身认知和直接知觉上的贡献也逐渐在历史尘埃中被重新发现^[28]。综上,我们有理由憧憬,布伦塔诺学派正在认知科学时代迎来全面复兴,从而为他心问题的跨学科反思注入新的活力。

① 心智主义和理智主义认为,他心一般是私密的、不透明的或者不可见的。我们缺少任何可以直接通达他人心理状态的途径,因此必须依赖并采用各种间接、迂回的方式才能理解他心。

【参 考 文 献】

- [1] ALBERTAZZI L, POLI R. Introduction Brentano and his school: reassembling the puzzle [C]// ALBERTAZZI L, LIBARDI M, POLI R. The school of Franz Brentano. Amsterdam: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3 – 21.
- [2] KRIEDEL U. Introduction [C]// KRIEDEL U.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Franz Brentano and the Brentano school.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7: 1.
- [3] BRENTANO F. Psychology from an empirical standpoint [M].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3: 88.
- [4] KING D B, VINEY W, WOODY W D.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deas and context [M]. 5th ed. Hove: Psychology Press, 2016: 271.
- [5] DENNETT D. The intentional stance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6: 17.
- [6] DENNETT D. The intentional stance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7: 47 – 48.
- [7] MEINONG A. On objects of high order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internal perception [C]// KALSI M S. Alexius Meinong on objects of high order and Husserl's phenomenolog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8: 137 – 208.
- [8] FINDLAY J N. Meinong's theory of objects and value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115.
- [9] MEINONG A. On assumptions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10] MEINONG A. Psychologisch – eth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werttheorie [M]. Graz: Leuschner & Lubensky, 1894: 24.
- [11] MEINONG A. Über urteilsgefühle: was sie sind und was sie nicht sind [J]. Archiv für die gesamte psychologie, 1906, 6: 22 – 58.
- [12] ORTONY A, CLORE G L, COLLINS A.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emotion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56 – 62.
- [13] MEINONG A. Über emotionale präsentation (on emotional presentation) [J]. Sitzungsberichte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ien, philosophisch – historische klasse, 1917, 183: 2 – 181.
- [14] REISENZEIN R. Arnold's theory of emo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 Cognition and emotion, 2006, 20: 920 – 951.
- [15] CHISHOLM R M. Objectives and intrinsic value [C]// CHISHOLM R M. Brentano and Meinong studies. Amsterdam: Rodopi, 1982: 80 – 91.

- [16] SCHINDLER R, KÖRNER A, BAUER S, et a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chadenfreude and sympathy: a developmental analysis [J/OL]. PLoS one, 2015, 10: 13 [2020-05-07].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37669>.
- [17] MALLE B F, ICKES W. Fritz Heider: philosopher and psychologist [C]// KIMBLE G A, WERTHEIMER M. Portraits of pioneers in psychology. Washing, D. 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0: 195-214.
- [18] HEIDER F. Ding und medium [J]. Symposium, 1925, 1: 109-157.
- [19] HEIDER F, SIMMEL M.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apparent behavior [J].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44, 57: 243-259.
- [20] HEIDER F.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M]. New York: Wiley Press, 1958: 2-5.
- [21] CARRUTHERS P. Simulation and self-knowledge: a defence of the theory-theory [C]// CARRUTHERS P, SMITH P K. Theories of theories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2-28.
- [22] WELLMAN H M. Making minds: how theory of mind develop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3-34.
- [23] ROESSLER J, PERNER J. Teleology: belief as perspective [C]// BARON-COHEN S, TAGER-FLUSBERG H, LOMBARDO M V. Understanding other minds: perspectives from developmental social neuro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35-50.
- [24] ZAHAVI D. Empathy and direct social perception: a phenomenological proposal [J].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2011, 2(3): 541-558.
- [25] KRUEGER J. Direct social perception [C]// NEWEN A, DE BRUIN L, GALLAGHER 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4E cogn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301-320.
- [26] OVERGAARD S. The unobservability thesis [J]. Synthese, 2017, 194(3): 743-760.
- [27] FUSAR-POLI P, BROOME M, STANGHELLINI G. From Brentano to mirror neurons: bridging phenomenolog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 [J]. Psychiatry research neuroimaging, 2010, 183(3): 245-246.
- [28] ANTONELLI M. Vittorio Benussi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M]. New York: Springer, 2018: 3.

Hidden Cue of Brentano School in Other Minds Problems: A Survey from the History of Cognitive Science

CHEN We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cognitive science, the problem of other minds, as the basis of epistemology, is embodied in many topics, concepts and entity theories with “family resemblance”, such as mind-reading, social cognition and folk psychology. However, from the Franz Brentano’s theory of intentionality, to the Brentano’s student, Alexius Meinong’s emotion theory based on the judgment, and then to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the heir to the school of Brentano, Fritz Heider’s attribution theory, can unravel an important clue to understand other minds problems. This approach directly illuminates the core issues of cognitive science, such as intentional stance,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theory of mind, and has a profound theoretical connection with the recent rise of the theory of direct social perception and the theory of mirror neurons.

Key words: problem of other minds; school of Brentano; intentionality; intentional stance; attribution theory

(责任编辑 殷 杰)